

漢語史學報專輯

(總第三輯)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 編

上海教育出版社



178

姜亮夫
蔣禮鴻
郭在貽先生

紀念文集

漢語史學報專輯(總第三輯)

姜亮夫 蔣禮鴻 郭在貽先生紀念文集

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 編
浙江大學古籍研究所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汉语史学报. 第3辑, 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
纪念文集 / 张涌泉等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7

ISBN 7-5320-8919-3

I. 汉... II. 张... III. ①汉语史—丛刊②汉语—
研究—古代—文集 IV. 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53850号

汉语史学报专辑(总第三辑)

姜亮夫 蒋礼鸿 郭在贻先生纪念文集

张涌泉 等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 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123号 邮编: 200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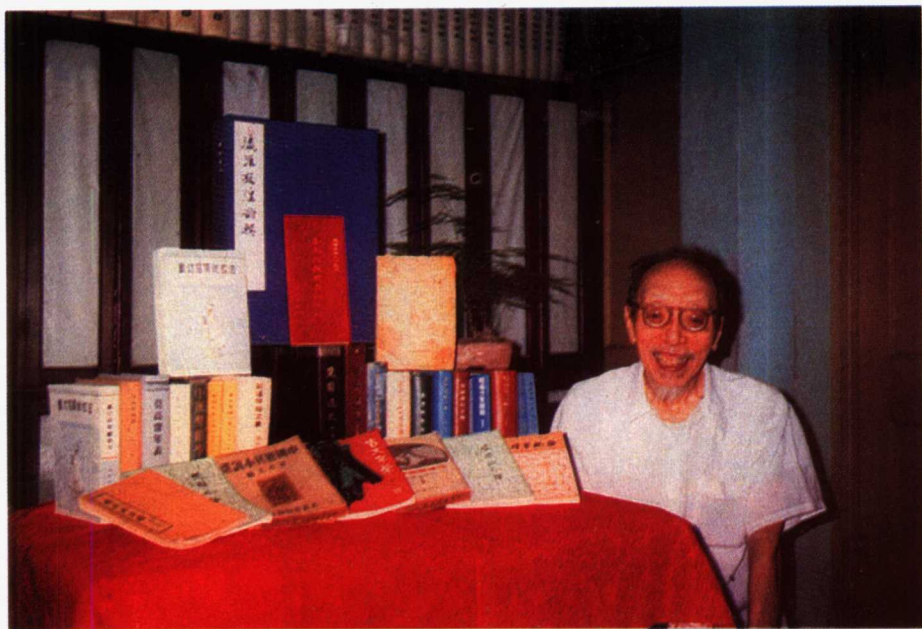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7.5 插页 12 字数 666,000

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本

ISBN 7-5320-8919-3/H·73 定价: (平)42.00元 (精)100.00元



姜亮夫先生 (1902-1995)

惜分飛

滿院薔薇開遍了
芍藥含苞小
花訊依然好
因風寧與相思道

碧澹青天偏杳渺
咤蝶嘆鶯懊惱
悶則

金樽倒紅樓
新月紗窗悄

憶江南
原意
二年五月十九日

清早起无意
便聞鶯斜想
江南天外路花

嬌柳恨正生情
芳草又連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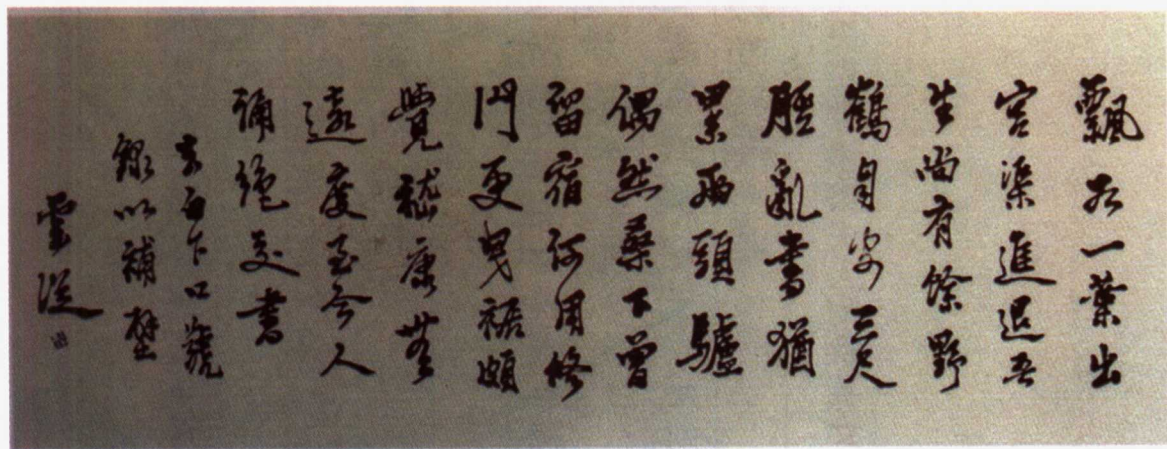
客來恨幾多
已還家若問
庭園何處好輕

輕嫩柳碧如
紗隱約遠山遮

姜亮夫先生手書夫人陶秋英女士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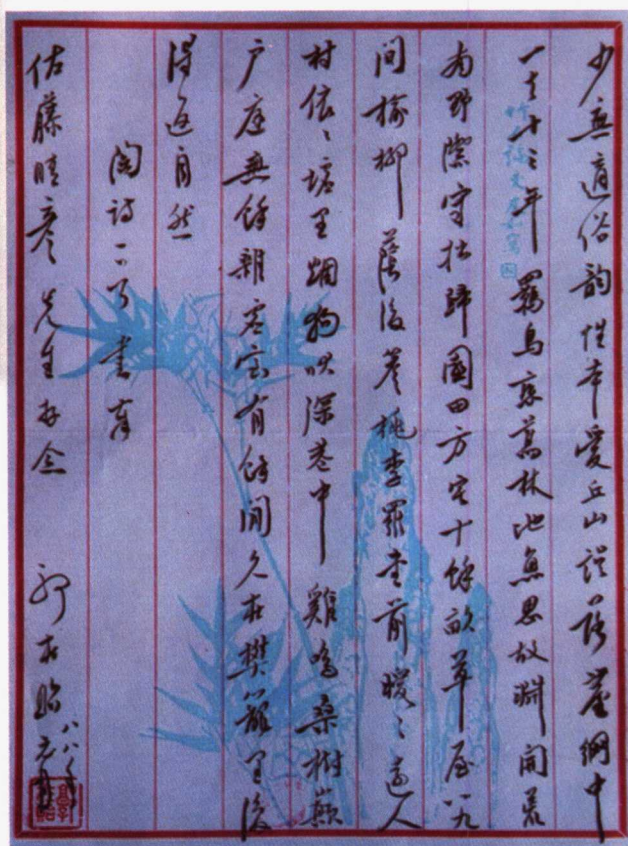
蔣禮鴻先生 (1916-1995)



蔣禮鴻先生手書



郭在貽先生 (1939-1989)



郭在貽先生手書陶淵明詩



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會代表合影

(2002年5月24日)



許嘉璐副委員長在紀念會上講話



唐作藩、丁邦新等
先生在紀念會上講話

許嘉璐副委員長、
潘雲鶴校長參觀姜亮夫、
蔣禮鴻、郭在贻先生著
作圖片展



紀念會會場

目 錄

姜亮夫先生傳略	傅 傑(1)
蔣禮鴻先生傳略	方一新(6)
郭在貽先生傳略	張涌泉(14)
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先生紀念會致辭	許嘉璐 潘雲鶴 毛昭晰 藍蔚青
丁邦新 唐作藩 趙振鐸 佐藤晴彦 蔣紹愚 熊國禎 柴劍虹 蔣冀騁	(18)
重讀《中國聲韻學》	
——紀念姜亮夫先生百年誕辰	唐作藩(32)
普及敦煌文化的開創之作	
——重新認識《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的歷史價值	柴劍虹(35)
《昭通方言疏證》與近代詞語考釋	王 鏌(40)
敦煌藏經洞魏晉寫經繫年訂補	
——紀念姜亮夫先生編撰《莫高窟年表》六十年	陳國燦(45)
扶植後學 金針度人	
——追憶蔣禮鴻先生對研究生的培養和指導	祝鴻杰(53)
蔣禮鴻學術思想芻議	劉曉紅(57)
斷港絕航 重開津逮	
——評新編諸子集成本《商君書錐指》	任繼昉(65)
姚刊三韻本不盡可依	
——讀《類篇考索》札記	姚永銘(69)
郭在貽先生與訓詁學	李建國(73)
難以忘却的思念	
——憶我的導師郭在貽先生	王雲路(79)
正本清源說異體	李 圃(82)
戰國文字中一種值得注意的構形方式	吳振武(92)
評《說文段注》的“辨通別”	黃金貴(94)
說簡化符號“丿”	周志鋒(107)
《集韻》的內部結構	趙振鐸(112)
窺基《法華音訓》原型考	丁 鋒(119)
顎近音的日化	朱曉農(129)
日本的中日詞典之現狀與課題	宮田一郎(143)
《經籍叢詁》與漢語辭書編纂	陳東輝(147)
上博楚簡《孔子詩論》管窺	汪維輝(154)

漢晉賦管窺·····	趙遼夫(159)
西元干支紀法互算·····	俞忠鑫(170)
偽書文獻語料價值述略·····	王魁偉(174)
傳統與現代的融合與創新	
——談漢語詞彙學研究的發展方向·····	蘇寶榮(178)
狄庸教授與佛教語文學研究·····	徐文堪(184)
《尚書》聯綿詞的類型兼論聯綿詞的構詞理據·····	錢宗武(189)
中古時期名詞重疊式的發展及其影響·····	石毓智(201)
《元典章·刑部》中的動補結構·····	李崇興(211)
從“祖、妣”說起·····	張惠英(220)
慧琳《一切經音義》特殊詞語研究·····	竺家寧(228)
《長阿含經》校讀記·····	蔣冀聘(242)
“文義賞會”釋義·····	李軍(248)
試論漢語古典詩句的多義性	
——從“明月別枝驚鵲”談起·····	孫力平(251)
關於《兒女英雄傳》的鈔本	
——從詞彙方面的考察·····	藤田益子(258)
成語教學與訓詁學·····	祝鴻熹(276)
敦煌疑偽經與靈驗記關係之考察·····	鄭阿財(283)
敦煌曆日與戰國秦漢《日書》的文化關聯·····	鄧文寬(292)
《俄藏敦煌文獻》儒家經典類寫本的定名與綴合	
——以第11—17冊未定名殘片為重點·····	許建平(302)
敦煌本《夢書》雜識·····	關長龍(316)
敦煌的故事綱要本·····	荒見泰史(326)
《破魔變》殘卷考證·····	黃征(348)
敦煌變文研究尚有可為·····	王繼如(358)
《敦煌寫本社邑文書輯校》補遺(四)·····	郝春文(368)
俄藏敦煌文獻的編纂出版·····	府憲展(387)
敦煌文獻與西北生態環境變遷研究·····	李并成(390)
從出土文獻看漢語對回鶻語的影響·····	楊富學(395)
道騫與《楚辭音》殘卷的作者新考·····	黃耀堃 黃海卓(401)
敦煌本《碎金》與宋、明俗用雜字之比較·····	朱鳳玉(411)
《敦煌邈真讚校錄並研究》校錄指瑕·····	江學旺(418)
試論浙江敦煌學研究的特色·····	趙和平(424)
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教授紀念會	
暨漢語史、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綜述·····	姚永銘(429)
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教授紀念會	
暨漢語史、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目錄·····	樓笑笑(434)
編後·····	張涌泉(437)

姜亮夫先生傳略

傳 傑

一

姜亮夫先生名寅清，以字行。1902年4月12日出生於雲南昭通。父親姜思讓，曾就讀清末大學堂，武昌起義後返家領導地方“光復”事業，雲南護國之役時又領導昭通募捐濟軍反袁。先生自幼即受到父親愛國思想的影響。1914年入昭通高等小學，1916年入雲南省立第二中學，1921年以本省官費生考入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國文部，得林思進、龔道耕、廖平諸先生指授，讀完了《詩經》、《尚書》、《荀子》、《史記》、《漢書》、《說文》、《廣韻》等典籍，為日後的中國文化研究植下了根基。1926年考入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從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諸先生問學，在王國維指導下完成了論文《詩騷聯綿字考》。畢業後在南通、無錫中學任教。1928年至上海，先後任大夏大學、暨南大學、中國公學、復旦大學教授及北新書局編輯。其間拜識了章太炎先生，章氏指導他從杜佑《通典》入手讀史，並告誡他要做一個真正的學人，不作空疏之學、嘩眾取寵之學，給他留下深刻印象。1933年任河南大學教授。1935年赴法國巴黎大學進修，接觸了多種西方人文科學名著。遇友人王重民，相約摹錄為伯希和所劫去的敦煌經卷，並親見了多種出自敦煌的藝術品，開始了敦煌學研究。其後又遊倫敦、羅馬、柏林，西方學者整理文物、研究學術的科學方法與寬闊途徑，給了他極大的啟發。1937年回國後，歷任東北大學教授、西北大學教授、雲南大學教授兼文法學院院長、昆明師範學院教授、英士大學教授兼文理學院院長，並曾任雲南省教育廳廳長、雲南省文教處處長。1950年至1951年在雲南革命大學高級研究班學習。1952年到雲南省博物館工作。1953年調任浙江師範學院（後改名為杭州大學）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83年組建杭州大學古籍研究所，任所長，為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生導師。曾被推舉為中國屈原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委員會會長、浙江省語言學會會長、中國音韻學研究會學術顧問、中國訓詁學研究會學術顧問、《漢語大字典》與《漢語大詞典》學術顧問、《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先秦文學分支主編。1995年12月4日在杭州病逝，終年九十三歲。

二

姜亮夫先生的治學，大抵以小學立根基，以史學致宏大，而尤湛深於楚辭學與敦煌學。已刊行的著作有：

一、《屈原賦校注》 屬稿於1929年，以明翻宋本洪興祖《楚辭補注》為底本，參校其他多種版本，復徵引《文選》、《史記》、《慧琳音義》、《太平御覽》等書，考證史實，訂正文字，按語詳

博，時出新解，為現代最有影響的屈賦注本之一。1957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晚年以“明斷是非”與“充實內容”為重點，加以重訂，1987年付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二、《楚辭書目五種》 在校注屈賦時搜集編撰的總結評價歷代有關《楚辭》著述的工具書，計分五個部分：（一）楚辭書目提要，內分輯注、音義、論評、考證四類，計二二八種；（二）楚辭圖譜提要，內分法書、畫圖、地圖、雜項四類，計四七種；（三）紹騷偶錄，著錄漢代以來摹擬屈賦的著作，以見屈賦對後世文學的影響，計書籍十九種，篇章一九二題，另著錄元代以來以屈宋之文編創的劇目八種；（四）楚辭札記目錄，著錄趙宋以來各家讀書札記中考證《楚辭》文字的條目，計八〇二題，又書籍一種；（五）楚辭論文目錄，主要著錄“五四”以來有關《楚辭》及其作者的論文目錄，在此以前的單篇論著亦附之，計四七七題。中華書局1961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修訂再版。

三、《楚辭今譯講錄》 先生1979年受教育部委託主辦《楚辭》學講習班，本書據授課錄音整理而成，共十二講，對《楚辭》的研究方法，屈原事迹，《楚辭》的源流、系統、藝術特色及各主要作品的内容旨意都作了深入淺出的闡說。北京出版社1981年初版，1983年修訂再版。

四、《楚辭學論文集》 收錄五十年間所撰有關《楚辭》的論文廿五篇，對屈原生平，屈原思想，作品的特點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楚辭》中的訓詁、語法、文例，《楚辭》學史以及楚史、楚地理與楚文化中的許多問題都作了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

五、《楚辭通故》 本書為先生治《楚辭》的總結性著作，對《楚辭》中出現的全部語詞與重要問題分類作了詳盡考釋，全書總為四輯十部：（一）天部；（二）地部；（三）人部；（四）史部；（五）意識部；（六）制度部；（七）文物部；（八）博物部；（九）書篇部；（十）詞部。後附檢目。全書徵引繁富，論辨深邃。齊魯書社1985年出版。

六、《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 原為所撰《敦煌志》中的總論，五十年代以白話改寫而成，對敦煌史地、敦煌文書與敦煌藝術都作了介紹。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出版。

七、《敦煌學概論》 先生1983年受教育部委託主辦敦煌學講習班，本書亦據授課錄音整理而成，共六講，涉及敦煌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價值、敦煌卷子與敦煌藝術的內容及特色、敦煌卷子的研究方法等。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

八、《敦煌學論文集》 收錄歷年所撰有關敦煌學的論文三八篇，既有關於敦煌歷史、文書、藝術等的專題研究，亦有資料綜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

九、《莫高窟年表》 本書將敦煌卷子中有年代可考者按年依次編定，正表起自晉惠帝永熙元年傳說莫高窟始建窟寺時，止於宋仁宗嘉祐二年，記錄了各經卷的不同歷史情況，表前則“攝照中原之往迹，以明敦煌體性之所有”，表後則略記藏經洞開啓至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之歷年大事，並附錄有《敦煌所見道教佚經考》、《敦煌寺名錄》及分類的《敦煌書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

一〇、《瀛涯敦煌韻輯》 成書於1942年，凡廿四卷，分三部分：（一）字部，摹錄藏於巴黎的敦煌韻書殘卷二七種，附錄六種；（二）論部，收論文廿一篇，多為所摹錄的卷子的考釋與論述；（三）韻部，為全書的總攝，綜合字部所收各卷及有關材料製成《隋唐宋韻部總譜》、《諸隋唐宋人韻書反切異文譜》、《諸韻切語上字不見於〈廣韻〉諸字譜》、《隋唐人韻書所載諸體字譜》，以便總觀比照各有關韻書的全貌。上海出版公司1952年出版。數十年中，先生時加訂補，重又寫定《瀛涯敦煌韻書卷子考釋》，於1990年付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一一、《中國聲韻學》 三十年代初期講授音韻學時所撰講義，是我國現代較早的比較全

面地概述傳統音韻學的著作之一。世界書局 1933 年出版。

一二、《文字樸識》 三十年代講授古文字學時撰的講義，結合王國維的古文字研究與章太炎的音韻學研究成果，考察文字的孳乳演變軌迹。其第一卷於 1946 年收入雲南大學文法學院叢書出版。

一三、《古文字學》 五十年代所撰古漢語教材中的文字部分，結合古代文化史實探討了漢字的產生及其形體的變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出版。

一四、《昭通方言疏證》 成書於二十年代，凡十卷：（一）釋詞；（二）釋天；（三）釋地；（四）釋人；（五）釋衣服；（六）釋飲食；（七）釋宮室；（八）釋器用；（九）釋博物；（十）附錄。記錄昭通方言語詞約四千個，明其音讀，證以古訓。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出版。

一五、《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 原名《歷代名人年里碑傳總表》，1937 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五十年代重加刪訂，改題今名。全書收錄自春秋末期至 1919 年以前去世的歷代人物一萬二千餘名，以表格形式按歷史順序列出諸人姓名、字號、籍貫、歲數、生卒年及所據材料出處，在生、卒年兩項中又分別注出帝號、年號、年數、干支及公元，是稽查我國歷史人物的生卒年、籍貫及碑傳情況的重要工具書。中華書局 1959 年出版。

上舉之外，姜先生已問世的著作還有《詩騷聯綿字考》（1932 年，昆明）、《夏殷民族考》（1933 年，上海）、《陳本禮楚辭精義留真》（1956 年，上海）、《陸平原年譜》（1957 年，上海）、《張華年譜》（1957 年，上海）、《屈原賦今譯》（1987 年，北京）、《古史學論文集》（1996 年，上海）等。他現存的全部著作，已匯編為《姜亮夫全集》，總二十四卷，於 2002 年由先生故鄉的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

姜亮夫先生的治學特點與治學方法，其要蓋在以下數端：

一、治學基石：資料與工具 先生治學涉及的面很廣，却都能取得豐碩的成果，關鍵在他對有關的各領域都下大力做了扎實的資料工作。治古史而成《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治《楚辭》而成《楚辭書目五種》，治敦煌學而成《莫高窟年表》，是其資料工作中之拳拳大者。在這樣詳備的資料基礎上來做專題研究，自然易於深入而不蹈空。他教導學生說：“要建立一個學術系統，要做到無微不至，必須以掌握資料為第一事。”“材料一定要搜集得比較完整一些。譬如搞《楚辭》，最好把《楚辭》全部有用的資料都找來，還要找一些同它有關係的東西，面要寬一些，有許多問題，你從正面來論證，可能證不出來，還要從反面、從側面、從上下四方來包圍它。”並強調說：“編工具書這種事，我們研究學問的人，非做不可。”他以其導師王國維為例，回憶“他每研究一種學問，一定先編有關的工具書。如研究金文，即先編成《宋代金文著錄表》和《國朝金文著錄表》；研究宋元戲曲，先做《曲錄》”，故對研究對象各方面的情況都能了然於胸，其研究成果“點點滴滴都有詳細的根據”。

二、治學中心：語言與歷史 先生認為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根本問題仍在語言與歷史兩事”，並自言“以語言及歷史為中心，此余數十年根株所在”。對這二者的關係，他的認識是辯證的，既認為自己的古史研究“植基於語言文字”，又指出“歷史是我們民族的大本大根，如不切實讀史，搞文字聲韻就缺乏堅實的基礎”。而所以要以語言與歷史為治學的根株，則“自語

言言有二義：（一）謂解釋文詞以馳驚語言學規律，務使形、聲、義三者無缺誤。（二）謂凡歷史事所借以表達之語言，必須與史實之發展相協調，不可有差失矛盾。以歷史言之，則歷史發展與語言規律之出入，繁變紛擾，往往與語言之變有如親之與子”。

三、治學方法：綜合與貫通 先生進一步指出：“然欲證史、語兩者之關涉，自本體本質，有不能說明者，於是而必須借助於其他學科，乃能透達，故往往一詞一義之標舉推闡，大體綜合社會諸科，乃覺昭晰。”因為“要證實一件事物的全體所需要的知識，是非常廣廓的，凡此事物有關的學科，你都得用到，這就是所謂‘綜合’，要綜合一切有關學科，纔能說明某一個學科”。譬如“我不滿意我的《屈原賦校注》，就是因為未曾使用一切語言、歷史、民族、地理、博物、生理、氏族社會、政治、哲學乃至天文、物理、化學等等許多知識，細細引入，以詳釋各詞語。於是，後來我儘量引進，儘量發揮，改寫成為《楚辭通故》”。他對綜合研究法的認識與他歐洲遊學的經歷有關，這促使他以後突破了自己“數十年單一的研究方法，吸收了國外學者綜合研究問題的經驗，在治學上開始有裕然綽然、有無適而不可之感。思想有凝滯的，可以抉擇了；材料方面有缺陷的，可以補充了。方法上更使我有了多樣化的路子，可以從四面八方來包圍它，有無往不適之樂。所以我現在更體會到，把方法論放在科研的第一位，是有其必要的。我縱觀先代的學術工作者，其成就的大小和深淺，往往決定於方法是否多方面的，是否靈活運用得純熟”。

四、治學態度：耐勞與求實 先生一生著述逾千萬言，廣涉多門學科，沒有刻苦耐勞的工作精神，要獲得這樣的成績，是不可想象的。他自稱是一個“遲鈍”的人，“因此，我在學術研究上，就有一種毫不為人所難的脾氣”，“可取的只有下笨功夫這一點，許多事都是在笨求中得到一綫光明，一絲成就”。他在不斷深入的研究中愈益感到“科研的天地，真是寬大得很，同時也細緻得很”，這更“促使我不知疲倦地工作”，並痛惜許多時間與精力都以不得已的原因被浪費了。在晚年雙目幾近失明的情況下，他仍堅持讀書寫作，指導學生，並勉勵青年“存永久堅強的毅力、自強不息的精神、艱苦卓絕的氣概，不作浮夸，不為文痞”。他強調治學必須“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從頭做起，不敢偷懶”，並說“我對《楚辭》也還有許多未弄懂的東西”，都體現了實事求是的學者態度。

四

姜亮夫先生在回顧自己的學術生涯時表示“始終對自己的工作不滿意”，然而他在中國古代文化研究中已經作出了多方面的貢獻。他的一系列著作在海內外屢次翻印，廣為流布。他的《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已成為治史者常備的工具書，也成為各種文史工具書書目中所必列的著作，如張舜徽教授主編的《中國史學名著題解》（1984年，北京）評價該書“取材豐富，考訂認真”，雖以篇幅鉅，錄者多，“仍有一些疏誤之處”，但“仍不失為一部使用方便、有較高價值的工具書，是同類書中的較好者”。他的《楚辭》論著，更為多種《楚辭》研究論著及《楚辭》注本反覆徵引，並給予了高度評價，如馬茂元教授主編的《楚辭研究集成》第二編《楚辭要籍解題》（1984年，武漢）收錄評述了《屈原賦校注》、《楚辭書目五種》及《楚辭今繹講錄》。論《校注》，則為“姜亮夫綜合屈原身世與戰國民族的歷史條件，結合文法分析，精細周密地來探索每一句每一篇的大義”，其“訓詁都是很有根據的，且能顯示作者具有很深的功力”；論《書

目》，則謂其書“並不限於書目的匯編，書中對前人著述，時加評議，指陳得失，褒貶得當，故使本書大為生色”，“雖是目錄學著作，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反映了姜氏的治學成果，是一部具有學術價值的專著”；論《講錄》，則謂：“在本書中，無論談哪一方面的問題，姜氏都能結合作品內容和時代背景，並通過實例的剖析加以闡發；因此，全書說理透徹，生動流暢，對讀者學習、理解《楚辭》，是很有益的。”姜亮夫先生辛勤治學，著作等身。他曾以“深沉邃密博雅，剛健篤實光輝”題贈後學，這既是他對後學的期望，也是他自己一生所追求的境界。

通訊地址：上海市復旦大學中文系 郵編：200433

蔣禮鴻先生傳略

方一新

壹

蔣禮鴻先生(1916—1995),字雲從,我國當代著名語言文字學家、敦煌學家、教育家,浙江嘉興人。生於1916年2月9日,時當農曆丙辰年,屬龍。其父請私塾先生取名,塾師以反切爲義,名爲禮鴻(“禮鴻”二字相切爲“龍”)。對這個名字,先生自己並不喜歡。後因《易·乾》上有“風從虎,雲從龍”的話,自字雲從。

雲從先生出身於城市貧民家庭,少年時曾在嘉興商業專校讀了兩年,因爲對經商之道向無興趣,後來轉入嘉興秀州中學讀初三。畢業後,由學校保送考進教會大學杭州之江文理學院(後改名爲之江大學)國文系,師從夏承燾、鍾泰、徐昂等先生。鍾泰先生反復涵泳、細究文章脈理的讀書方法,夏承燾先生謙虛樂受的讀書態度,徐昂先生誠摯不已的治學精神都對先生有很大的熏陶和啓發。因爲家境貧寒,先生靠借債、勤工儉學以及獲取獎學金修完了大學學業。

之江畢業後,先留校做了半年國文系助教,又到湖南安化縣藍田鎮國立師範學院擔任了約三年的國文系助教。後和師母盛靜霞戀愛、結婚,遂到四川重慶,在國立中央大學師範學院國文系和文學院中文系任助教、講師約四年。曾和聞一多、吳組緝、魏建猷、王仲華、管雄、任銘善、錢子厚等學者交往共事,相得甚歡。抗戰勝利後,隨中央大學回到南京,一年後又回到母校杭州之江文理學院任講師。1951年院系調整時,調至浙江師範學院中文系任講師,後學校改名爲杭州大學。此後一直在杭州大學中文系任教,擔任講師、語言教研室主任。在“文革”中受到過衝擊,進過“牛棚”。1978年9月從講師直接評定爲教授。1986年,經國務院學位評議委員會評定,增設杭州大學漢語史專業爲博士點,先生和郭在貽師一起被評定爲博士生導師。曾擔任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語言文學委員會副會長、浙江省語言學會名譽會長、浙江省敦煌學會副會長、《漢語大詞典》副主編、《辭海》編委兼分科主編。九三學社社員。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5年5月9日因肺癌在杭州去世,享年79歲。

貳

縱觀雲從先生的學術成就,可以用“博大精深”四字概括之。所謂“博大”,指其治學領域十分寬廣,涉及傳統訓詁學、文字學、古漢語通論、近代漢語、校勘學、辭典編纂學以及古籍整理等;所謂“精深”,指其每一領域的研究都做到了厚積薄發,深耕細作,重發明創造,絕無敷衍鑿空之作。

一、傳統訓詁學、校勘學研究

訓詁學是先生做學問的根柢，功力深厚。早在 1942 年，先生住在湖南安化縣的藍田鎮，就着手撰寫《商君書錐指》，歷時三年完稿，時年二十九歲。本書廣採嚴可均、錢熙祚、俞樾、孫詒讓、陶鴻慶、王時潤、朱師轍、陳啓天諸家校釋成果，校以《藝文類聚》、《群書治要》、《意林》、《太平御覽》、《路史》、《古今圖書集成》諸書引文，加以比勘考定。在校勘、訓釋兩方面都取得了較高的成就，顯示了精深的學養和功力。本書在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舉行的唯一的一次學術著作評獎中獲得三等獎（一等獎空缺，聞一多、楊樹達均獲二等獎）。時隔四十多年，《商君書錐指》仍是閱讀《商君書》的重要參考著作，故被中華書局列入《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出版。

解放後，儘管有歷次運動的磨難，使大批知識分子浪擲了許多寶貴時間，但先生專精治學，勤奮耕耘，仍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先後出版的訓詁學著作有《義府續貂》、《懷任齋文集》、《蔣禮鴻語言文字學論叢》等。

《義府續貂》是先生在傳統訓詁學領域的一部重要代表作，以考索文字音義、推求詞源為其旨歸。因寫作趨向和清初學者黃生的《義府》相仿，遂謙其辭以“續貂”名書。實際上，其成就遠出《義府》之上。徐復先生譽為“窮極研幾，後出轉精”之作，可謂的評。清代學者對漢語音義關係有十分精闢的見解，如王念孫說：“義存於聲，聲近義通，求之於聲則得，求之於文則惑。”本書即以王氏等的論述為指導思想，有意識地從語言的角度來探索詞義、詞源。本書的內容十分廣泛，尤以抉發字詞僻義和徵引現代方言俗語來考求詞源為兩大特色。初版於 1980 年，當時共收條目 242 條，所轄語詞 337 個。此後，作者又作了進一步修訂，補正了全書三分之一以上的條目，新增加了 58 個條目，於 1987 年出版了第 2 版。

《懷任齋文集》、《蔣禮鴻語言文字學論叢》是兩本論文集，匯集了先生歷年所寫的一批論文，其內容大抵不出訓詁和校勘兩端（《懷任齋文集》中還有若干辭書編纂方面的文章）。訓詁和校勘本來就是相互依存，難分彼此的。如在《校勘略說》一文中，作者舉《韓非子·外儲說左下》：“墾草仞邑。”俞樾說：“仞當作勑，謂勑造其邑也。作仞者字之誤。《新序》載此事正作勑邑，當據以訂正。”其實仞是勑的同音通用字，勑有充滿、充實義，仞邑就是使城邑充實繁盛的意思。《史記·殷本紀》：“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可證作“仞”並不誤，無煩校改。這例說的是校勘問題，但實際上涉及訓詁問題。在《大鶴山人校本〈清真詞〉箋記》提到《黃鸝繞碧樹》詞中“爭如盛飲流霞，醉偎瓊樹”兩句，陳元龍注本如此，而汲古閣本“盛飲流霞”四字作“剩引榴花”，孰是孰非？作者指出：“剩”有多義，“引”有引滿義，“榴花”是酒名，因此是汲古本對而陳注本誤改。這是箋釋的問題，也是校勘的問題，而到頭來還是說明“剩”、“引”、“榴花”的意義，仍然是訓詁問題。

論文集還談到訓詁學和校勘學的理論問題，如在《訓詁學略說》一文中，先生對何謂訓詁和訓詁學、訓詁學和其他學科的關係、怎樣理解“反訓”等問題談了自己的意見。在《懷任齋文集·後記》中，先生談了整理古籍的兩個原則，即：一、整理古籍，要還其原來的面貌，不能因為書上文從字順就滿足。二、校訂、解釋古籍要有確當的根據，不能隨便立說——凡此都具有指導意義。